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曾宪通自选集

曾宪通◎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曾宪通自选集

曾宪通◎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宪通自选集/曾宪通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二)

ISBN 978 - 7 - 306 - 06135 - 5

I. ①曾… II. ①曾… III. ①汉字—古文字学—文集

IV. ①H1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7718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裴大泉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刘丽丽 赵 婷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2.75 印张 38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曾宪通

1935年1月生，广东潮安人。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在古文字学研究室当助教，主要从事汉语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容庚、商承祚两教授治古文字之学，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文字。1985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汉语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以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文学会和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长沙楚帛书文字编》、《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合著）、《曾宪通学术文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汉字源流》（合著）等专著及论文近百篇。曾荣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和三等奖。2015年被评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宋珊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指明了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4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2015年评选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0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毛蕴诗（中山大学）、冯达文（中山大学）、胡经之（深圳大学）、桑兵（中山大学）、徐真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修己(中山大学)、蒋述卓(暨南大学)、曾宪通(中山大学)、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在推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的基础上,继续编选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当代岭南学术名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工作繁忙,但对编选工作都高度重视。他们亲自编选,亲自校对,并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

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学术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能迈上新台阶。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7年11月

学术自传

◎ 曾宪通

我的乳名叫曾雄镇，1935年1月（农历甲戌腊八）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彩塘镇驷塘乡——桑浦山下一个负山吞江、碧野秀水的侨乡。先考讳曾松锦公，年十六即随长辈到马来亚谋生，先后当过锡矿工、橡胶农和店员。家族中的成年男性几乎散居在南洋各地，家中只有祖母、母亲、姐姐和我。母亲为了使儿子在成长中不失阳刚之气，便让我从小就近在“耕余小筑”同农民兄弟住在一起。“耕余小筑”是单身农民聚居的地方，也是农民农闲聚会和娱乐的场所，潮俗称之为“闲间”。我在“闲间”里不但养成与人和谐相处的习惯，还从长辈那里了解到四时农事和许多民间习俗，并学习潮乐和潮曲，能用“工尺谱”背诵上百首“弦诗”，学会用《潮声十五音》替不识字的侨眷回复侨批等。小学就读于星洲侨领曾汝平乡贤创办的“务滋学校”，正式启用学名曾宪通。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年，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县小学生“较艺”获奖。小学毕业后，先后在潮安二中和金山中学读初中和高中。

1955年秋，我在汕头金山中学毕业，即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康乐园度过了第一个中秋节。当容庚教授和夫人将同大家一起赏月的消息传来，宿舍里一片欢腾。记得当晚皓月悬空，全班同学围坐在东大球场的绿草坪上，一边品尝着广州的五仁月饼，一边听着容庚先生和夫人聊聊康乐园的故事。康乐园原来是岭南大学的校园，因在珠江边的康乐村而得名，而康乐村则据说同谢灵运（号康乐）到过附近的下渡村有关。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从此便成为中山大学的校园了。容庚先生就是这样从岭南大学来到中山大学的。同学们都知道，容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但当时许多同学都不知道古文字为何物，便七嘴八舌地向容先生讨教。容先生答得很风趣，他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的祖宗用过而你们今天还不认得的字。”但他把话锋一转说：“其实要学古文字也不困难，我当初学钟鼎文时还不是个中学生？”接着他便断断续

续地介绍他自己如何在舅父邓尔雅的影响下学习《说文》，如何同弟妹们分工搜集古文字资料编书，又如何夹着《金文编》稿本谒见了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进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毕业后又如何进入燕京大学成为教授的，等等。容先生这次讲话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大家明白，他是怎样通过研究古文字，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一跃而成为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的。当时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设有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开设的课程几乎有一半是语言文字学的。在系里多位语言文字学家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历史悠久的传统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修习了语言文字学系列的全部课程，用心钻研，并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学术的殿堂里，还有语言文字学这块宽广无垠的天地，渴望着窥探其中的奥秘。

1959年暮春，容庚先生带着四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实习，学校让我提前毕业作为容庚先生的助手随行。这次实习历时两个多月，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看到了许多传世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拜会了多位向往已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唐兰和郭沫若两位先生。当时我们一行住在故宫博物院的西角楼招待所，经常在故宫的金石室见到唐兰先生。容先生一见面就批评唐先生守着故宫大批青铜器，不编图录供大家使用。而唐先生总是笑呵呵地回答说：“编图录不算研究，这不是我的工作。”还经常对我们说：“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之内，而在古文字之外。”这使我朦胧地意识到，研究古文字并非认识几个古字那么简单。有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通知我们，郭沫若院长准备在前海家中接见我们，令我们非常兴奋。原来郭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避难日本研究古文字时，就与容庚先生订下文字之交。这次一听说容先生带学生到北京实习，便欣然答应会见。记得当时郭老刚从安阳考察回到北京，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安阳圆坑墓的发现情况，并回答了我们一行提出的许多学术问题。这次随同实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批老祖宗使用过的古文字实物资料，眼界大开，知道要在古文字学领域里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尤其要了解与古文字密切相关的历史、考古和古器物学等背景资料，光靠课堂上的学习和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959年8月，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正式毕业，组织上分配我留校在古文字学研究室工作，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兼任古文字研究室秘书，协助室主任商承祚教授开展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当我向容庚先生报告自己留校

当助教时，没料到他竟给我大泼冷水。他说：“现在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青年人何苦来钻这个冷门？”后来，他见我并没有动摇，便把他妹妹容媛编著的《金石书录目》送给我，还无私地开放他那著名的“五千卷金石室”供我自由地阅读，还叮嘱我把他的藏书记号移录到自己的书上，以便按图索骥。并布置我临摹《说文解字》、《金文编》和《甲骨文编》三部字书，细心比较彼此的异同，留意某些器物上的特殊写法。他常对我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又说：“一个人要做学问，光靠平日博闻强记是不够的，必须借助‘目录’一类的工具书作为治学的阶梯，这本《金石书录目》你要好好地加以利用。”容庚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使我明白做学问必须善于学习、勤于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才能达致科学的顶点。

1961年深秋，商承祚教授带领王子超和我到郑州和北京两地摹校信阳楚墓出土的竹简。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每天靠生蒜头送玉米粥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商先生毫无怨言，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于地下库房与资料室之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商先生对残简拼接和简文临摹有很丰富的经验。他认为，残简拼接要注意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协调。内部条件指字形和文意，同一个字的用笔体势往往因人而异，同篇文章的文气也必然是上下连贯的。属于同一写手的字而又上下文意通达无碍是拼接残简最基本的条件，再参照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和残简断口的形状，以及相关的花纹、色泽等外部条件，即可作出判断了。商先生说：“具备这些条件的拼复工作，是往往可以做到十拿九稳的。”商先生对于简文的临摹，则主张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先无我然后才有我。所谓“无我”，就是要做到完全客观地，将所见的笔画准确无误地临摹下来，而不管它对与不对；所谓“有我”，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判断其笔画和结体是否符合规律，然后决定如何取舍；对于笔画漫漶不清和残缺不全的字，尤其需要反复斟酌和推敲。商先生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我们日后整理竹简的指南。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介绍容庚先生到全国各地搜集青铜器资料，准备改编容庚先生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改编小组成员除张维持、马国权外，我也忝列其中。我们随同容庚先生到全国十六个省市作学术考察，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并收集到大量的

青铜器资料。回校后即着手改编工作，有若干篇章已经写出初稿。但苦于后续的图片资料不济，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遂告中断。一项将实现的宏图大略，终因不可逆料的原因而夭折，这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踏入古文字学门槛的第一个阶段，这段时间的许多日子都是在容庚、商承祚二位老先生身边度过的。二位前辈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强调第一手材料、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对我影响至深，特别是容庚先生一贯倡导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是自己克服困难的座右铭。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74年初夏，当时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出土之后，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都是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考古收获。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一大批学者组成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初，我是作为商承祚教授的随行人员加入这一行列的，说起来有点偶然。我本来并不是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有一次，当我翻阅罗福颐先生初步整理的简本《孙子兵法》时，在一篇名为《形》篇的简文中，发现有不少句子总是重重复复地出现。对于这一现象，我提出可能存在两个写本的看法，得到朱德熙先生的支持。朱先生嘱咐我试着按照不同字体重新加以整理。这样一来，原先重复出现的简文果然按照不同写本各就各位，泾渭分明，不再重复出现，证明确是两个写本无疑。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一些与《孙子》十三篇有关及十三篇以外的《孙子》佚文的残简，因而朱德熙先生建议由我继续整理简本《孙子兵法》，其他人发现的相关简文也归到我这里来，并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与简本相校注。随后，我又参加了简本《尉繚子》校注、《孙臆兵法》简注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等。直到1976年夏天，因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不能继续在红楼工作，外地学者陆续离开北京，我也于8月上旬回到广州。

这次在北京红楼工作，我不但接触到一批批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还认识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老专家，以及同辈学者中的众多佼佼者，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高尚的品德和可贵的学识，明确了自己治学的方向和目标。这对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是在整理临沂汉简的过程中，

在朱德熙先生的主持下，与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等先生一起讨论残简的拼接、编联和文字的考释、通读等问题，受到很大的启发。朱德熙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特点是重视字形而又不囿于字形，他注重透过文字符号去了解较为隐蔽的语言事实，这样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出土文字资料的释读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光从字形上看问题，往往感到“山穷水复疑无路”，就在这个时候，朱先生常用的口头禅是：“换一个角度看看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不妨从文字背后隐蔽的语言事实来考察。这样一来，往往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这就是语言学意识的效应。在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上，有没有这个“意识”是大不一样的。它使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多了一条思路，多了一个角度和一条门径。这对于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79年的初冬，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广州举行第二届学术年会，由商承祚教授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我和赵诚任秘书长兼负责操办具体的会务工作。这届年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到得最齐，除容庚、商承祚两位先生外，还有于省吾、徐中舒、顾铁符、周祖谟、孙常叙、胡厚宣、张政烺、朱德熙、沈之瑜、启功、张颔等先生，相聚一堂，盛况空前；二是开始有海外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国际著名的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就是首次回内地参加学术活动的。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吴南生书记特地设宴欢迎饶宗颐先生的到来。他希望饶宗颐先生今后多到内地看看，还指着我说，“必要时可叫宪通陪陪，这也是向饶老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秋天，饶宗颐教授应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的邀请，在往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当时文物出版社派郑昌政先生专程到成都迎候，我也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从成都出发，先后到过宝鸡、兰州、敦煌、西安、洛阳、登封、郑州、开封、武汉、荆州、奉节、宜昌、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常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衡阳、广州等地，历时三个多月，行程达数万里。饶宗颐先生回香港后，特地请名家用顾炎武名句“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刻了一方印章作为纪念。在这次旅行中，饶先生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兴奋异常。由于先生对楚地出土文物情有独钟，在考察过程中，即拟定“楚地出土文献研究”这一课题，

邀我共同研究。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饶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共同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饶宗颐先生是位“博古通今，中西融贯”的国际著名汉学大家，在我有缘随侍左右的二三十个月里，饶先生总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令人如沐春风。在此期间，除了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向饶先生请教古代术数、乐律和天文历法之外，还领悟到不少治学的门径。就有关研究地下出土文献而言，饶先生不但主张要释文字、明义理，更强调要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饶先生非常重视“三点论”，即掌握焦点，发挥特点，尤其着力于关联性的层面和“问题点”的研究，即把研究对象的相关事物尽可能汇集起来，从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其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从横的空间方面考究其交流、传播和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进而从错综、交叉的关系中，寻找其说明种种现象的内部规律。正是饶先生这种追溯文化渊源的强烈意识和不知疲倦的求索精神，一直激励着自己不断地探索和进取。

以上是我研习古代文字的三个阶段。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是三次机遇和三度升华，即培植根基—明确方向—把古文字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长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掌握古文字资料的内涵，进而窥探语言、历史、文化等现象与规律，揭示其中底蕴，从微观以窥宏观。尽管本人的研究成果很有限，但我相信自己的路子是走对了的。这应归功于我的老师和多位长辈对我的关爱和悉心的指导。在他们的向导下，我才能够在这块古老的园地里不断地耕耘和收获。

目录

学术自传 / 1

“作”字探源

——兼谈“未”字的流变 / 1

释“鳳”“皇”及其相关诸字 / 15

说繇 / 25

楚文字释丛 / 36

楚帛书文字新订 / 47

说“跖”“鼯”及其它 / 55

“宮”及相关诸字考辨 / 60

从曾侯乙编钟之钟虞铜人说“虞”与“業” / 67

再说“蚩”符 / 77

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与训诂问题 / 87

吴王光编钟铭文的再探讨 / 99

关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 / 120

宋代著录楚公逆钟铭文补释 / 142

《周易·睽》卦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论 / 150

《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论 / 156

《保训》篇“中”字别解 / 163

包山卜筮简考释 / 169

试论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 / 180

居延汉简研究二题 / 194

敦煌本古文《尚书》“三郊三逋”辨正

——兼论逋、述二字之关系 / 202

汉字起源的探索 / 208

楚帛书神话系统试说 / 219

楚月名初探

——兼谈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 / 230

战国楚地简帛文字书法浅析 / 245

秦汉时制刍议 / 258

容庚先生与中国青铜器学 / 271

商锡永先生与楚帛书之缘及其贡献 / 290

选堂先生与荆楚文化的研究 / 297

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概述 / 310

明本潮州戏文疑难字试释 / 338

附录 曾宪通主要著述目录 / 347

“作”字探源

——兼谈“未”字的流变

“作”字古作“乍”，自古至今都是个常用字。可是“乍”的初形所象何物，朔谊所指何事，前辈学者虽然做过不少探讨，但至今仍没有一种为大家所认同的意见。就《说文》家而言，许书将“乍”字隶于亡部，说解云：“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一，一，有所碍也。”（此从小徐本）^①可见许慎据篆文立说。清代《说文》家于“乍”字亦无善解，段玉裁改说解为“止亡词也”，云“有人逃亡而一止之”。桂馥谓“止也者，为一所碍而止也”。王筠疑“曰”字“或当作止”，谓“一曰亡”当作“一止亡也”。朱骏声以为字“从亡，一以碍之，指事，与𠂇以碍𠂇，𠂇以邕川，毋以止奸，𠂇以止𠂇同意”。显然四家皆以小徐“一，有所碍也”为依据。其余各家说解间或不同，然类多望文之训，更不足据。

卜辞有𠂇、𠂇等形，孙诒让首释为“乍”^②，但无解释。郭沫若先生早年曾以𠂇为𠂇之初文，他说：“卜辞有𠂇字，亦作𠂇，罗氏入《待问》编中，按此即乍字。”又云：“作之作𠂇若𠂇，余意乃𠂇形之变，𠂇即𠂇之初文。《说文》云：‘𠂇持也，象手有所𠂇据也，读若戟。’戟音与作同部，《秦风·无衣》正以泽、戟、作三字为韵。是𠂇之与𠂇形音义俱相若也。”^③叶玉森以为郭说难以成立，叶云：“郭氏《释作》篇推阐甚详，惟谓𠂇乃𠂇形之讹变，即𠂇初文，余谛审𠂇、𠂇、𠂇、𠂇诸形，与卜辞𠂇字及从𠂇诸文均作跪踞形且象手指者迥别，是说尚未能信。”^④后来，郭沫若先生复据金文“𠂇”字重加推衍，谓“𠂇”“乃象人伸脚而坐有所操作之形，即作之初字，量侯殷文作𠂇，从木，其形尤著”^⑤。李孝定氏在《金文诂林读后记》中对郭说颇置疑辞，以为“𠂇”之字形从𠂇，“已不

① 《说文》小徐本“从亡一”，大徐本作“从亡从一”，下无“一有所碍也”。

② 孙诒让：《契文举例》下，第16页。

③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初版）卷一《释作》。

④ 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一，第94页。

⑤ 郭沫若：《金文余释·释亡乍》。